

第一章 井冈山精神的形成

任何时代精神都不可避免地要烙下时代的印记，井冈山精神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时代和历史原因。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伟大的井冈山斗争是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在低潮是井冈山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是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地理条件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高尚品德是井冈山精神形成的重要的人文因素，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是井冈山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 31 万之多，共产党员的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 6 万多人减少到不足 1 万人，革命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形势极其严峻。大革命的失败导致了革命低潮，这表明尚处于幼年时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与错误，从而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思

考并探索革命前进的道路。

1927年8月1日发动的南昌起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党史上和军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党在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上用大量的鲜血为代价换来的结论。八七会议后，江西的星子、万安、弋阳、横峰、赣县，广东的海陆丰、广州和琼崖地区，湖南的宜章、醴陵、桑植、平江、长沙，湖北的黄安、麻城和洪湖地区，福建的平和、龙岩、上杭、永定，以及陕西、河北、河南和江苏等省，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重走北伐战争的道路，以攻打大城市为目标，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采取的是十月革命“城市中心”的模式，脱离了中国现实国情，最终都先后失败，教训十分深刻。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的尝试，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认识到，在敌我力量悬殊，中心城市反动势力强大的现实情况下，只有到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去，才会有发展革命的广阔天地。一些在起义中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革命道路的探索中，率先走出迷雾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农民、湖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武装为主力，组织5000余人发起了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起义军从破坏汉粤铁路开始行动，最初也是以夺取湖南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会攻长沙，曾一度占领醴陵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反动

军队的力量远比起义军强大，各路起义队伍都先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建立中心城市革命政权的目标无法实现。这时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9月14日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命令起义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前敌委员会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离开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境内，沿罗霄山脉南进，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找立足之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秋收起义部队于9月25日攻占莲花县城，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秋收起义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共700余人，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情况介绍，前敌委员会派人与宁冈县党组织和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古城，当日召开前委扩大会。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6日，毛泽东在宁冈的大苍村会见井冈山农民武装领袖袁文才，赠送给他100余枝步枪。袁文才当即允诺帮助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并资助银元近千元。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茅坪，在当地设立留守处和医院。随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大井会见了另一位农民武装领袖王佐，送给他70枝枪，王佐欣然拨500担谷子给工农革命军作军粮。28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的茅坪。

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湘赣边界地区恢复和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永新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特别支部；工农革命军发展为两个团，并帮助

地方建立了赤卫队、暴动队等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活动。革命武装先后攻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并在当地成立了县级工农兵政府，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朱德、陈毅率领八一南昌起义部分部队辗转于湘粤赣，并组织发动了湘南暴动。因强敌进攻，主动撤出湖南，分两路向井冈山转移。毛泽东率部在桂东、汝城和酃县城郊与敌激战，掩护湘南起义部队安全转移。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起义的部分部队在江西宁冈砦市会师，宣告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正式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红四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朱毛两军的会师壮大了边界的革命武装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为适应边区斗争的需要，经湘、赣两省省委批准，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特委统一指导边界的斗争，下辖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五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大会以后，边界各县、区、乡的党组织普遍建立起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调集湘军吴尚第八军、赣军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分别从湖南的攸县、安仁、茶陵、酃县和江西的吉安、永新、莲花、遂川，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会剿”。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采取以守势对湘军，以攻势对赣军的策略，于5月上旬在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缴枪300余枝；6月23日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战役中又歼灭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枝。第一次反“会剿”大获全胜。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红色割据区域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及吉安、安福、遂川、酃县、茶陵各一

部分 红色版图总面积为 7200 余平方公里 人口 50 余万。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也曾出现过曲折，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1928 年 7 月，执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湖南省委趁毛泽东远在永新之机，强行把红军大队拉往湘南，致使红军大队损失过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片区域相继失陷，导致“八月失败”。为了挽救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亲率红 31 团 3 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 留红 31 团 1 营坚守井冈山。8 月 30 日 敌军 4 个团围攻井冈山黄洋界，不足一个营的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凭险抗击，浴血奋战，先后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中红军战士把一门刚刚修好的迫击炮抬上黄洋界。一颗炮弹击中了敌指挥所，敌人以为红军大队回来了，连夜仓惶逃跑。毛泽东得知消息后 以极其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9 月 13 日，毛泽东率红军大队攻克遂川县城，俘敌营长以下官兵 200 余人。此后，红军收复宁冈，再克遂川，在宁冈睦村和酃县沔渡击溃湘军一个团，在宁冈新城和龙源口连战皆捷，恢复了边界割据 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会剿”。

敌人长期的严密封锁与“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食盐、布匹、药材奇缺，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井冈山军民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迎难而上，自力更生，创办了被服厂、造币厂和红色贸易圩场，战胜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1928 年底，湘赣两省敌军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值此危机时刻 彭德怀、滕代远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率领平江起义后组建的红五军四、五纵队，冲破敌人重重阻截，于 12 月 10 日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

为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会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主力3600余人出击赣南，迂回敌后，打击敌人。彭德怀等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的32团留守井冈山。1月26日，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领导井冈山军民与敌激战数昼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黄洋界、八面山等哨口相继失守。在四面受敌、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为避免更大损失，特委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千余人向遂川方向突围，去赣南同毛泽东会合，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而基本上结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的历史。

三、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实践

井冈山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突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使一再受挫的革命力量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井冈山斗争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

1. 工农武装割据。自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畏艰辛，巧用奇兵，率领湘赣边区军民出宁冈，攻茶陵，入遂川，占永新，连破数县。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在72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毛泽东总结实践斗争的经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是三位一体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

2. 党的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始终重视党的建设，把实现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这是红军初创时期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创举，使部队中党的组织系统有了坚实的基础，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湘赣边界党组织非常注重思想上建党，多次作出决议，加强党内教育，向地方和军队的干部战士灌输无产阶级思想。

3. 红色政权建设。1927 年 11 月上旬，工农革命军一部沿湘赣边界游击，11 日攻占了茶陵县城。由工农革命军委派县长，成立茶陵县人民委员会。28 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撤销县人委，成立了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和士兵代表组成的县工农兵政府。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红色政权之一。它对于边界红色政权的建立，乃至对于全国各地红色政权的建立，都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4. 开展土地革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制定了“保护中小商人”的工商政策，发展公营和集股两种经济形式的公买处，创办红军造币厂，制造足银的“工”字银圆，调剂货币流通，稳定金融市场，促进了红区白区的物资交流，活跃了商品经济。同时，从发展农业生产、创办军工企业和活跃经济、繁荣集市贸易三个方面入手，解决井冈山的生产和经济问题，使红色政权得以稳固地发展。

四、井冈山精神的孕育

井冈山精神是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培育起来的。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体力行、正确领导，是井冈山精神孕育和产生的决定性条件。他们领导湘赣边界军民与敌人殊死斗争，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明确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率先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大力弘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给井冈山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是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客观因素。井冈山地处边远山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生活艰苦。革命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军事“会剿”和严密的经济封

锁，造成生活日用品和战争物资奇缺。严酷的现实环境锤炼出了井冈山军民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革命精神。

井冈山军民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井冈山精神诞生的重要条件。湘赣边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大革命失败后，边界军民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而屈服，他们多次举行暴动，坚持开展武装斗争。朱毛红军上山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尽扫阴霾，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军民跟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

井冈山独特的政治地位使井冈山精神得以迅速形成。在创建全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井冈山上汇聚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杰出领导人。他们之中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军事家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朱德；有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元帅彭德怀；有文韬武略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等等。他们之中有数以万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甘愿献出生命的革命者，其中在新中国成立后 荣膺元帅军衔有五人 大将、上将、中将与少将数十人 不少人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坚定的信念、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战略、奋斗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各个根据地的表率，也使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得天独厚的政治环境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一种完全适应于斗争形势需要的革命精神风貌迅速形成。井冈山精神经过战争炮火的洗礼和艰苦岁月的磨炼，在中国革命的摇篮升华、结晶成了中国革命斗争事业的精神瑰宝。

第二节 井冈山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

湘赣边界井冈山的斗争 自始至终都是“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进行的。敌我力量之悬殊，阶级对峙之尖锐，武装斗争之残酷，经济情形之恶劣，物质必需品之匮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实属罕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革命的空前低落和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卓绝，激励了党和红军重振旗鼓的雄心、锤炼了党和红军百折不挠的斗志，奠定了井冈山精神的坚实基础。

一、中国革命的低潮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了低潮，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清党”、“反共”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全国城乡一片白色恐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鄂、湘、粤、赣、豫、闽诸省的武装起义，都遭受到严重挫折。此时，受“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的党中央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仍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企图先夺取中心城市作为革命的中心，然后再向农村发展。按照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中心城市的少数革命群众一再举行武装起义，各地的武装力量继续进攻中心城市，结果都被占强大优势的敌军打得惨败。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再次遭受严重损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建立了比旧军阀更强大、更残暴、更严密的反革命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形势的基本特征是：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过去，革命转入低潮。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全党都在为挽救革命，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艰难的探索，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浴血奋战。中心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

最强大，对革命防范最严密的地方；极其广阔的农村地区则是反革命统治较弱、鞭长莫及之地。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认识到，必须到农村去，特别是要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洗礼的农村去，寻找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

二、极端严酷的湘赣边界态势

“马日事变”^①后，边界各县的共产党组织已经完全垮台。农会遭到破坏，地方武装只有袁文才、王佐各 60 枝枪在井冈山附近活动。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的枪支全部缴给了豪绅，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在遂川，陈正人等共产党人遭到通缉、被捕，有的甚至惨遭杀害。在永新，贺敏学、胡波等 80 余人被捕。在莲花，土豪捣毁了工会、农会，并在叛徒的内应下，将农民自卫军的 60 枝枪拉走 59 枝。在酃县、茶陵，共产党员朱子和被枪杀，农民自卫军的 400 枝枪悉数被缴。至 10 月毛泽东率部抵达时，边界各县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

但是，党在边界各县播下的革命火种，却遍布乡镇，犹如原上之草。地方党员坚定不移的意志，边界民众渴望革命的普遍心态，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群众基础，这是井冈山精神形成的最广袤、最基本的土壤。

毛泽东率部进驻井冈山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悬殊，武装斗争十分尖锐，敌人调集强大于红军许多倍的兵力，多次对井冈山根据地进“会剿”。湘系军阀常驻茶陵、攸县、酃县的兵力为吴尚的第八军第一、第二两师，其第七军、第十六军等五个师常驻湘南，随时可以策应、支援；滇系军阀用于边界的兵力由初始的杨如轩第二十

^① 马日事变：1927 年 5 月 21 日，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兵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捣毁各级革命组织，分裂国共合作，史称“马日事变”。

七师 增加至第七师、第九师、第十二师等约六个旅。除了正规军外，边界各县尚有土豪劣绅武装 2000 之众。这些无恶不作的保安队极端仇视红色政权，为虎作伥，横行乡里，杀戮焚烧，残酷至极。

武装斗争的激烈、残酷程度与日俱增。自 1927 年 10 月上旬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到 1929 年 1 月中旬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不足 14 个月间，红军连续粉碎赣敌四次“进剿”，湘赣两省敌军三次“会剿”，红军历经“三月失败”、“八月失败”两次重大挫折，大小战斗近百次。敌军“进剿”、“会剿”的兵力一次胜于一次，规模一次大于一次，攻势一次猛于一次，间隔时间却一次短于一次。

以赣敌“进剿”为例，兵力由第一次的两个团逐次增至五个团，时间由两个月缩至 10 天。湘赣两省敌军“会剿”由起初的两个师 11 个团，增加到六个旅共 18 个团，三万之众。而我军则始终不足四团，与敌军周旋，浴血肉搏，数度“间发不容”，危险异常。“幸得地形优势，居高临下”，“悻悻一鼓败之，其间战机的危险非常严重，不为敌人所败者几希”。

敌军在开展频繁的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实施最严密的政治经济封锁。据文献记载，“一里以内红白势力分歧处，严密警戒，不能越雷池一步”，“层层步哨，密密罗网，要单身通过或少数武装通过这个包围是极困难的事。越境侦渡，发觉了，必无幸免，农民罹难者不计其数”。

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军民日常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成了红色政权无法逾越的障碍，时刻威胁着党和红军的生存。边界原是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艰苦。红军抵达后经济情形愈发恶化。加上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政策，货物金融彼此不能流通，需用缺乏供不应求，生活十分艰难。农民生产的丝、木、茶油、大米、花生子等生产品不能运出卖钱，而食盐、棉花、布匹等日用需、物品，却无法取得。红军经济的唯一来源就是打土豪。宁冈、永新、茶陵县、遂川等附近的土豪都打尽了，再要打就必

须远一点；要远一点就必须与敌人硬拼一次才能通过，所以打一次土豪就必须大部队出动，付出代价。红军的生活与经济非常艰难，衣不得暖 饥不得饱 经济问题成了军民最困难的问题 以至于“ 打倒资本家 天天吃南瓜 ”成了士兵生活的“ 最高理想 ”。

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全国革命的低潮，激励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抗争意识；白色恐怖的四面包围，政治上孤立无援，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日甚一日，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艰辛困难，激发了红军将士万死不辞、一往无前的奋斗意志。井冈山精神就是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时代氛围中孕育、诞生。

第三节 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一。所谓地理环境，是指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地形、气候、土壤、森林、山脉、河流、湖泊、矿藏以及植物和动物等等。

地理环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需要在劳动中和周围的自然进行经常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离开了地理环境，生产劳动就无法存在，人类社会也难以发展。井冈山精神既是中国革命空前低潮和斗争艰苦卓绝时代的产物，也与井冈山根据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井冈山根据地的地理概貌

雄伟壮丽的罗霄山脉 横亘鄂湘赣粤四省 北起鄂南通城、崇阳、通山 南至粤北南雄、始兴。井冈山根据地处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

根据地内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沟壑纵横。高山和丘陵 占全境总面积的 85% 宁冈、永新、遂川等县尤为突出。宁冈山地约占

总面积的 63% 丘陵占 15% 低丘岗地占 22%。罗霄山脉主支脉绵延全境，地势崎岖，起伏较大。境内重要的山峰海拔均在 1000 米以上 最高峰海拔 1560 米。永新山地约占总面积 46% 境内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 31 座。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地势落差为 1300 米以上 是明显的山间盆地地形。古人描绘：“眼观西北三千界 势压东南数百洲。”

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建立了两块军事根据地。一为井冈山，一为九陇山。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介于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间。北麓是宁冈的茅坪 南麓是遂川的黄坳 两地相距 180 里。地势呈明显的两级阶梯，仅有七条崎岖的山道通往山外。

1928 年 5 月，这里成为红四军的军事根据地。九陇山是湘赣边界的第二块军事根据地 位于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之交 方圆约 35 公里。境内峰峦叠嶂 冲坳回旋 形成九条冲陇 全山仅三个隘口与山外相通 是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九陇山和井冈山互为犄角，共同捍卫着湘赣边界的宁冈大本营 其奇特的地理条件 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环境。

二、特殊地理环境对井冈山精神孕育、形成、发展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正所谓山川不同，风格迥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对塑造人们的心理、气质、观念等精神因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井冈山根据地高山和丘陵占全境总面积的 85%。红军的作战、行军、发动群众、建党建政、休养生息 均离不开山区。连绵无尽的群山和崎岖蜿蜒的小道，首先向红军指战员发起了挑战 检验着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信仰、胆略、气概和毅力。毛泽东曾有穿草鞋磨烂脚的经历；朱德饱尝虱子长满全身的苦楚；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的陈毅感慨天天跑路、天天战斗的烦

恼；万安农家女子康克清目睹经历了“万安暴动”血与火拼杀的同伴，因受不了山路行军艰险而离队的情形；农运骨干王紫峰困惑山路峻险，言语交际困难；湘南女师的学生彭儒上山之始遇到的第一问题就是生活之难。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工作、生活，红军战士在大山的挑战中赢得了胜利，战胜了崇山峻岭带来的无数艰难险阻。由对山的畏惧到能爬山打仗，并由衷热爱井冈山；由缺油少盐、南瓜充饥的窘迫到唱出“红米饭 南瓜汤 秋茄子 味好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的豪迈歌谣，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开创精神。

井冈山特殊的地理环境，要求红军每个战士都必须养成适应艰苦自然环境的习性。朱良才的御寒方法颇有代表性：“井冈山的冬天非常寒冷，可我们还要穿着单衣。就拿我来说，一条长单裤，因为连续战斗，不论风里雨里，白天黑夜，起来一身，睡下一铺，早已不像样，要补又找不到布，只得挖东墙补西墙，撕了裤腿补裤裆，撕来撕去，把一条长裤撕成了短裤。为了时刻准备粉碎敌人的可能进攻，部队冒着严寒加紧训练，天一黑，屋子就生起火来，大家围着火上课或开会。会后，就在火旁铺起稻草，有秩序地睡下。天亮起床，到野外跑步、刺枪、劈刀、刺长矛等，身上冒出汗来，把一夜的寒气都赶跑了。在工事里的同志们，就不停地挥动铁镐，这样既加强了工事，又可以不冷。”久而久之，井冈山军民的精神素质更坚实、更具韧性，有足够的力量承受最沉重的压力。

第四节 井冈山精神形成的人文因素

“人文”的含意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性、教养及同人类自身有关的学问。井冈山精神是党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奋斗群体的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和区域属性等人文因素的产物。井冈山精神既脱胎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母体，又集中凝聚和充分展现出

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性，放射出绚烂的光彩。

一、中华民族的传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塑造了自己崇高、优秀的民族个体。这些崇高、优秀的民族个体，又在斗争中坚持、弘扬和发展成民族性格，形成了独具光彩的民族传统。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正是这样，我们的民族虽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然而却一次又一次衰而复兴，蹶而复振，转危为安，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传统也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滋润、哺育了井冈山军民，井冈山精神脱胎于民族传统的母体，吮吸着民族传统博大精深、永不枯竭的乳汁。

中华民族的传统首先表现为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关注和对人民大众命运的无限关心。这一传统，在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反映得尤为集中、强烈。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深层次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传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成长过程。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相比，所受的磨难和打击要大得多。封建统治者把知识分子贬到很低的地位，有“九儒十丐”之说。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自暴自弃，他们始终心中装着祖国、人民，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早在 2000 多年前，楚国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极力主张改革，遭到贵族势力的反对和诬陷，被放逐江南。但他仍坚持理想，关心人民疾苦，希望祖国富强昌盛，“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民族传统为历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所继承，影响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因此，爱国主义成为中华

民族传统的核心。国难临头，中国人民总是能挺身而出，视死如归，以身报国。当统治阶级卖国求荣、苟且偷安，侵略者践踏祖国大好河山之时，他们总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义无反顾，用鲜血和生命报效祖国。西汉苏武奉命出使，被扣牧羊 20 年，穷且益坚，不辱使命，终不屈服，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南宋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但誓死不降，大义凛然，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正因为有千千万万舍生取义的民族英烈，我们的民族利益才没有被剥夺，正义的事业才得以成功。

中华民族的传统还表现在发愤图强、百折不挠。任何民族都有遭遇失败、挫折、屈辱的时候，面对挫折、失败、屈辱，是不求进取，自甘灭亡，还是忍辱负重，发愤图强？这是对一个民族精神气节的严峻考验。春秋末期，越王勾践为报亡国之仇，刻苦自励，发愤图强，卧薪尝胆，又常常以会稽之耻警告自己，终于寻得机会，打败了吴王，使越国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这一典故一直教育、告诫后代，如何发愤图强，如何面对失败而不甘落后，积极进取。《列子·汤问》中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年过 90 的愚公，率子子孙孙挖山不止，志在搬去太行、王屋两山。《山海经·海外北经》所载夸父追日的神话也是人们熟知的。这些神话所揭示的，都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中华民族传统的第三个表现是勤劳朴实。《尚书·大禹谟》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翻开人类文明的史册，中华民族祖先的勤劳朴实是举世公认的。我们的祖先最早学会了使用火，懂得了制造石器、陶器的道理，掌握了捕鱼、狩猎、农业和畜牧业技术，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筑造了万里长城，对人类文明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丰衣足食。尚俭朴、戒奢侈、勤耕耘，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他们

无不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民族传统。

中华民族传统的第四个表现是大公无私。大禹治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疏通三江五河；“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敢入”。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献身事业、忘我奋斗的精神。人民大众中，有许许多多不图名利、大公无私、默默奉献、吃苦耐劳的人。有难，他们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他们是支撑国家社稷的脊梁，振兴民族昌盛的中坚；是中华民族得以生息、繁衍、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而地处罗霄山脉中端的湘赣边界的人民，由于长期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刻苦耐劳、忠厚朴实、乐观豁达，显得尤为突出。边界地处偏僻山区，经济落后，人们多务农，商人及读书人只有极少数。有些地方尚处于杵臼时代。民众吃苦耐劳、淳朴忠厚的传统秉性随处可见。但边民们也绝非任人宰割、逆来顺受的“羔羊”，迁徙立足的客籍始祖，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群众性的“闹教”，抵制“仇货”，梭子兵，武装反抗便是明证。大革命中边界各县风起云涌、势不可挡的农民运动，则是群众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写照。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愿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用鲁迅先生的话来称赞湘赣边界的民性是不为过誉的。

井冈山精神形成的人文因素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就是湘民民风的影响。在红军队伍中，“湖南人约占全军人数的1/2”。杨克敏给中央的报告，谈及红军成分时也说：“有原来的老兵，平浏岳的农民，湘南的农民，当地的农民。”说明当年在井冈山浴血奋战的群体中，湖南人和湘赣边界人所占的比例较大。

湖南人重气节，尚诚朴，不计功利，但求仁义，以剽悍勇猛、不怕牺牲著称。自古就有“无湘不成军”之说。每每国家危难，湘人